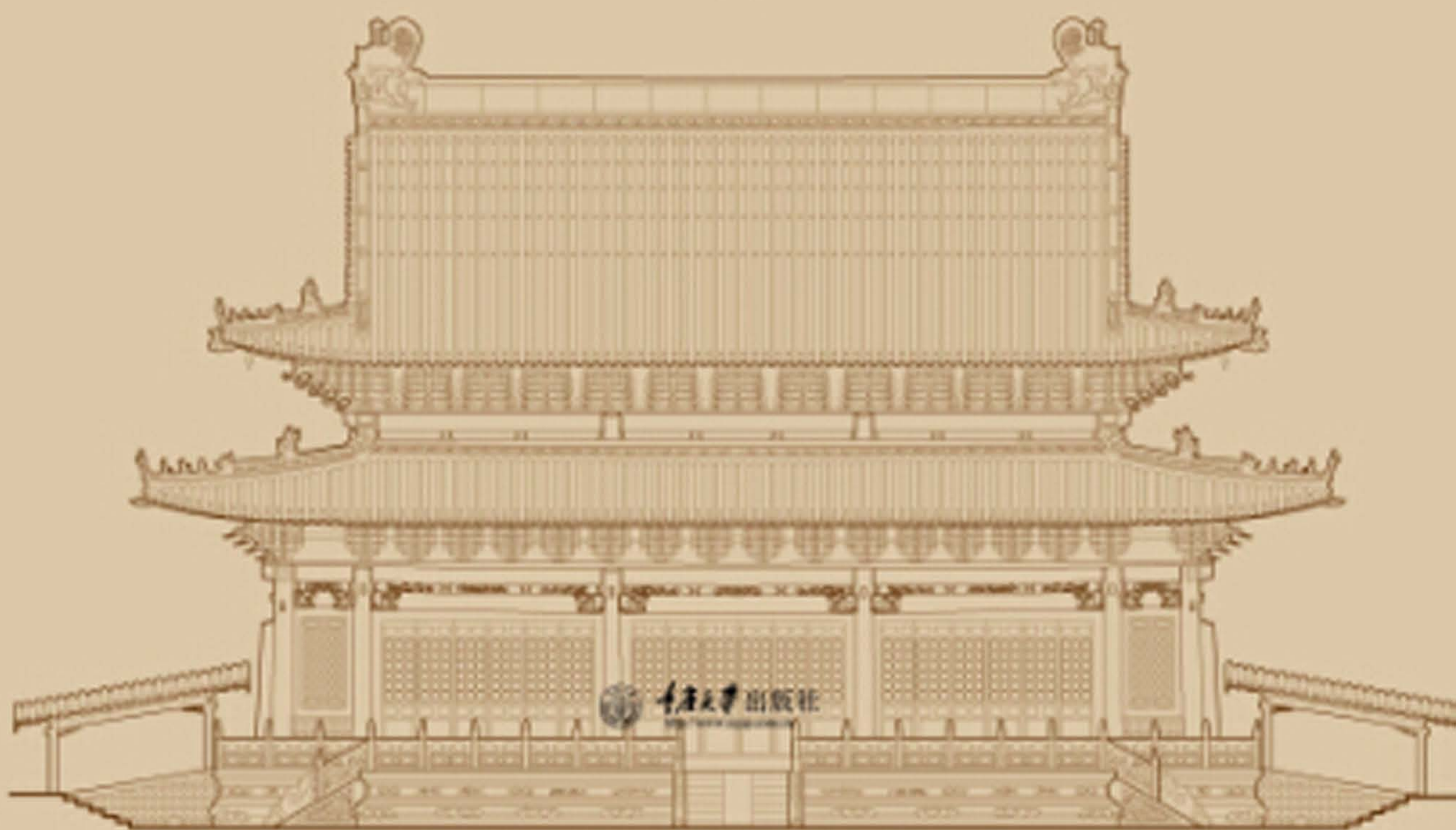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

平武报恩寺

张其成 彭晓 彭晓 彭晓
张其成 彭晓 彭晓 彭晓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

平武报恩寺

PINGWU BAOENSI

张兴国 郭璇 陈蔚 总主编
郭璇 戴秋思 编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平武报恩寺 / 郭璇, 戴秋思编著. —重庆: 重庆

大学出版社, 2015.3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

ISBN 978-7-5624-8580-3

I . ①平… II . ①郭…②戴… III . ①寺庙—古建筑

—介绍—平武县 IV . ① 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6877 号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
Pictorial Historic Recordings of Representative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Southwest China

平武报恩寺

Bao-en Temple of Pingwu

郭 璇 戴秋思 编著

策划编辑: 林青山 张 婷

责任编辑: 林青山 版式设计: 范云川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8 印张: 35.25 字数: 905 千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8580-3 定价: 350.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序

中国国土广袤，地貌、气候多样，决定了其建筑体系下各地建筑呈现出丰富的地域特征，反映了文化的多元性。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该区域内的传统建筑取材丰富、形态多姿，是我国民族和地域建筑的宝库。《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书系囊括了西南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的案例，其中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石窟寺的奇葩——大足石刻，我国明代官式建筑的经典案例平武报恩寺，西南禅宗祖庭梁平双桂堂，以及民间祠庙会馆建筑和摩崖风景建筑的杰作镇远青龙洞。这些古建筑均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而该书系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图文，全面记录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揭示了其价值，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作为全国历史最悠久的八所建筑院系之一，创办该院系的老一辈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参与了中国营造学社对西南地区传统建筑的调查与研究，为创建中国的建筑史学、探索

中国建筑史研究方法作出了历史贡献，培养了不少人才并组成了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重庆分所，其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学术积淀深厚、地域特色鲜明，并积累了大量的传统建筑实测资料。《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是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多名专家学者近三十年来对西南地区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的调查研究成果以及多年来该学院师生对古建筑测绘、研究的成果集合。这些成果不但是师生们辛勤劳动的结晶，而且是十分珍贵的重要历史文献。今将这些珍贵资料汇编成书系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特别是“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这些古建筑测绘资料将是西南地区古建筑保护与修复的重要、可靠的图文史料依据，为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基础。

愿书系的出版激发更多有识之士和民间大众对我国建筑遗产的珍视和保护之情。



2013年夏初于故宫博物院

丛书序

西南地区悠久的历史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建筑文化。云南元谋遗址，重庆大溪遗址，成都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都反映出西南地域优秀的建筑文化成就；东汉的崖墓、汉阙、画像石与画像砖，反映了早期中国建筑形制及其优秀的建筑文化技术水平；唐宋摩崖石刻中的建筑形象，折射出西南地区佛教建筑的高峰水平。西南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民族民俗文化丰富，明清以来遗存的古典建筑呈现多元化和地域化特色。

西南地区遗存的古典建筑，是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技术遗产。但古建筑的设计施工主要靠世袭工匠言传身教，尤其是地方性民间性的古建筑，更是靠经验积累相传，少有文献记载，更无图纸档案留存。要系统整理这笔巨大的遗产，需要大量而艰苦的田野调查，尤其是准确的建筑测绘资料整理。从20世纪上半叶起，梁思成、刘敦桢等大批建筑界前辈，为中国建筑研究和测绘调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调查测绘，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营造学社先辈们对云南、四川古建筑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类型涉及寺观、衙署、祠庙、会馆、城堡、桥梁、民居、塔幢、崖墓、墓阙等，并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发表《云南一颗印》《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旋螺殿》《四川南溪李庄宋墓》《云南之塔幢》《成都清真寺》等文，应是最早公开出版的西南古建筑研究成果。后来不少营造学社的先辈到高校执教，如梁思成、刘敦桢等，是高校古建筑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先驱。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叶仲玘先生，他就有过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经历，来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任首届系主任，营造学社的精神在建筑系无形延续。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古建筑测绘，主要由全国建筑高校承担起

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是当时西南地区唯一拥有建筑系的高校。结合教学和科研工作，建校之初就建立了建筑历史研究室，并成立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重庆分所。研究室的学者来自全国各地，辜其一、叶启燊、邵俊仪、吕祖谦、吕少怀、余卓群、白佐民、尹培桐、罗裕锬、杨嵩林、万钟英等，是建筑历史研究室开创以来的老一辈学者，他们对西南地区历史建筑研究作出了贡献，并培养了大批从事建筑历史理论研究的人才，他们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建筑历史理论研究的后来者。

建筑历史研究室的老一辈们，对历史建筑研究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扎根西南地区几十年甚至默默奉献一生。担任首届历史研究室主任的辜其一先生，在极其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几乎走遍了巴蜀大地，坚持巴蜀地区的汉唐古建筑研究，系统调查整理巴蜀的东汉崖墓建筑，绘制出测绘图文手稿两大册，他在“文革”中含冤而去，可惜没能最终整理出版；所幸的是他早期调查整理的摩崖石刻中的唐宋建筑，通过《文物》杂志发表，成为研究巴蜀唐宋建筑珍贵的图文史料。叶启燊、邵俊仪等先生，系统开展了四川民居的调查测绘，他们还深入川西高原的羌藏地区、大凉山的彝族山区，开展对少数民族建筑的调查研究，部分资料已整理出版，叶启燊先生所著的《四川藏族住宅》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曾师从于刘敦桢的邵俊仪先生，调查整理发表了《重庆吊脚楼民居》学术论文，在传统吊脚楼民居荡然无存的重庆城区，其图文史料价值显得尤其珍贵。

几十年来，结合教学与科研工作，建筑系的师生测绘了上百项古建筑，并留下大量测绘图文资料档案。平武报恩寺、成都杜甫草堂、成都武侯祠、成都望江公园、眉山三苏祠、峨眉山寺庙群、青城

山道观、大足圣寿寺、潼南大佛寺、涪滩二佛寺、镇远青龙洞、重庆湖广会馆、梁平双桂堂、重庆老君洞道观等，都是这些年来有代表性的古建筑测绘项目。这些测绘资料成果，成为国家及地方文物保护单位的必备资料档案，更为文物保护修复设计提供了技术支持。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平武报恩寺遭到地震的摧残，师生们30年前的测绘资料，其用于修复设计的价值凸显。近20年来，结合民居研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开展了民居建筑群、古镇古村落的测绘调查。重庆双江民居、贵州镇远民居、习水土城古镇、四川古蔺太平古镇、四川肖溪古镇、重庆东溪古镇、重庆涪滩古镇等，都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测绘研究成果。

由于诸多原因，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较多的留存在档案室，甚至不同程度地损坏缺失，没能公开整理出版，甚为遗憾。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资助，激励我们将这些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首批整理了四川平武报恩寺、贵州镇远青龙洞、重庆梁平双桂堂、重庆大足石刻与古建筑群等测绘资料，并由重庆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这四组古建筑群的测绘时间跨越了30年，代表不同时期的测绘资料成果，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特色的建筑。平武报恩寺是巴蜀明代的建筑原物，反映了典型的北方官式建筑风格风貌，对其的测绘是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级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的；贵州镇远青龙洞是一组具有特色的摩崖式古建筑群，建筑群依附于陡峭的崖壁，出挑吊脚，凌空飞架，是山地建筑空间组织和营造技术的优秀典例；大足石刻是中国南方佛教石窟寺的杰出代表，大足圣寿寺是一组丘陵山地古建筑群，建筑布局结合坡地起伏变化，逐步往后升高，群体空间轮廓线尤为突出，其山门运用牌楼门式处理手法，在

巴蜀地区的佛教建筑群中具有代表意义；测绘于21世纪初的梁平双桂堂，被誉为“西南禅宗祖庭”，其空间组合既强调佛教寺院的轴线空间序列，又巧妙结合民间院落空间组织特色，在建筑营造技术上，巧妙运用石木组合构架技术，建筑的地域特色浓厚，是佛教建筑地域化特色的典型例证。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所呈现的，仅是几十年测绘成果的一部分，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将整理、出版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西南地区的古建筑类型极其丰富，有价值的建筑遗产远远不止这些，需要更多团队和有志于古建筑的研究人员去抢救和整理，一系列完整的西南古典建筑图文史料才将会展现于世。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的出版，得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齐康院士、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晋宏逵先生、重庆市名城专委会主任何智亚先生、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先生、重庆市文物局前副总工程师吴涛先生等专家和支持和积极推荐，特此表示感谢！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涉及几百位建筑专业学生的辛勤劳动，他们既学习又奉献。资料的整理、出版，更是对从事古建筑研究的老一辈研究学者的最好纪念。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前言

平武报恩寺为明正统五年（1440年）始由龙州宣抚司土官金事王玺、王鉴父子奉旨主持修建，主体工程于正统十一年（1446年）基本竣工。它和青海瞿昙寺、北京智化寺同为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宫殿式寺庙建筑群。平武报恩寺远离封建政治中心和官式建筑活动中心，却具典型的官式建筑特征。它是国内罕见的建筑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式建筑风格的佛教寺院，也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代表，被誉为“明代罕见之遗物”，对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平武报恩寺建筑坐落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地处龙门山系涪江河谷中的龙安府故城（今绵阳市平武县龙安镇），海拔约1500米。报恩寺在选址和布局上，既遵循了中国传统寺庙建筑的一般规律，又受到当地风俗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建筑群依山就势，呈西高东低的三阶台地布置，采取了坐西朝东的布局形式，与我国寺庙坐北朝南的传统做法迥然相异。这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定，同时也与特定的历史文化因素相关。当地羌等少数民族以东为尊，本有崇日而东拜的习俗；再者，如当时修建寺院的目的确实是为了“祝延圣寿”，明皇城在平武之东，王玺所设的“龙位”也正朝东方，报恩寺建筑采取坐西朝东的布局也就不足为怪了。

平武报恩寺总建筑面积3500余平方米，现占地面积2.5公顷，主体建筑以东西方向为轴线，三进院落东西长270余米，南北宽100余米；中轴线上有四座大殿，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万佛阁，并与寺前广场、经幢、石狮、钟楼、华严藏、大悲殿、南北御碑亭与廊庑等组成院落空间序列。建筑在纵深布局的空间处理上采取一抑一放的手法，表现出设计者高度的思想和艺术造诣。建筑群檐牙高啄，殿院参差错落，在群山环抱下更显得气势恢宏、深远莫测。

从建筑的形制上看，平武报恩寺是一座寺庙和宫殿特征兼而有之的古代佛寺建筑群。除符合寺院建筑的一般形制外，报恩寺建筑与明代宫殿建筑多有相似之处。例如，寺前广场和金水桥的设置，大雄宝殿左右各设置了造型独特的斜廊且与周围其他建筑互不挨靠。“斜廊式”的布局在同时期的寺院建筑中已不多见，而主要见于明代的宫殿建筑当中。大雄宝殿抱厦部分构架与合基形式不符，似为改寺时模仿同时期庙宇建筑的形制而后来添加。故而，该建筑群的建造动因是寺报皇恩还是僭越等级的王府后改为佛寺，学界至今仍有争议。

平武报恩寺的建筑形式极其丰富，每组建筑群的单体建筑造型均不同：其中山门建筑为五开间，单檐悬山顶；钟楼三开间，重檐歇山顶；天王殿五开间，单檐歇山顶；大悲、华严两殿皆为三开间，重檐歇山顶；大雄宝殿为五开间，重檐歇山顶；御碑亭为三开间，上檐为八角攒尖顶，而下檐为方形，构思大胆，造型别致。万佛阁为五开间，重檐三滴水。除了帝王宫殿最高等级的庑殿顶外，报恩寺几乎集中了中国古代建筑屋顶的全部式样。

报恩寺各建筑的结构构架属正统大木系统，一方面表现出从宋



测绘现场师生合影



测绘现场同学合影（一）

元向明清过渡的时代特征，同时也体现出官式和地方民间手法相结合的特点。寺内各建筑斗拱如云，尺度较清式为大，宏雄有力，结构作用明显，但斗拱的踩数、等级又不拘规则，形式十分富于变化。报恩寺建筑中的斗拱多采用象鼻昂、斜拱等装饰性很强的形式，尤其是斜拱花样之多，为全国少见，很好地糅合了官式做法和地方风格。

报恩寺单体建筑均为“穿斗式”与“抬梁式”合并使用。各殿梁架结构原则相同，天花以下明袱为抬梁式，天花以上草栿为穿斗式做法。各殿多用分心槽加副阶周匝之制，侧脚生起明显，不仅美观，且具有优越的抗震性能。此外，报恩寺建筑主体构架用材为精选楠木，因件配料，质量颇高，历经多次地震的考验，仍能保存完整。

报恩寺建筑的屋顶、八字墙等多处使用琉璃，这些琉璃不仅图案优美、色彩绚烂，且烧制工艺精良。报恩寺建筑的内、外檐装修构图华巧，大雄宝殿和天王殿等处仍保留部分明代门窗原物，天花为明清所称的“井口天花”，是明清建筑中天花的最高形制。建筑彩画也是报恩寺建筑特别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与其同期的智化寺、法海寺不同，是另一风格的明代彩画，同时局部又保留了宋风。此外，建筑中的壁画、彩塑均为明代建筑中之精品。

平武报恩寺是明代民族边远地区特殊政治制度、社会状况以及建筑艺术和技术工艺水平的重要历史见证。在泥石流、地震及阴湿时常威胁的环境中，经受清代以后数年的兵燹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而保存下来，实为难能可贵。建筑群极高的历史、艺术、文化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至今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现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组织恢复高考后的第一、第二届学生开展了对平武报恩寺建筑群的调查测绘，这也是“文革”结束后西南地区乃至同时期全国开展的最大规模的古建筑测绘之一。此次测绘共完成精美的测绘图手稿近百张。这批测绘图纸承载着几代建筑学人的辛劳，也记录了时代发展的轨迹。如今，参加测绘的指导教师叶启燊先生业已故去，邵俊仪、白佐民先生也年逾八旬，李先逵先生则已退休，当年学生中的刘家琨、汤桦、徐行川、戴志中、杨文炎、李秉奇等人则已成长为当代的著名建筑师和学者。2008年，平武报恩寺建筑遭受“五·一二”汶川大地震的影响，昔日的测绘成果更显珍贵。2010年，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中青年教师指导建筑学本科学生对这批测绘图纸进行了数字化处理。2013年包括《平武报恩寺》在内的《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丛书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使得这批珍贵的史料得以问世。

本书的前言部分对平武报恩寺的地理区位、建筑的总体风格特点等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第一部分对报恩寺建造的起因进行了考证，此部分内容收录自邵俊仪先生指导、李志荣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并基本保持了文字的原貌，作为一家之言，是对老一辈学者建筑教育工作的纪念，同时也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筑历史研究成果的真实反映；第二部分是本书的主体，该部分汇集了报恩寺内各个建筑的平、立、剖面测绘图纸，以及斗栱、小木作和彩绘详图等，图纸基本保持了80年代初测绘成果的原貌，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和少量修正，彩色照片大部分为现状照片；第三部分汇集了彩塑、壁画、石雕、碑



测绘现场同学合影（二）

文等附属文物的图文史料；第四部分是地震灾害对平武报恩寺的影响与灾后修复简述，并附地震后实景照片，最后收录了平武报恩寺彩画复原图、建筑斗栱形式和等级一览表以及大事年表。全书内容充实饱满，为平武报恩寺古建筑群的研究、保护提供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

感谢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的同仁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最后，对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全体老、中、青教师在历年来的古建筑调查测绘和研究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系是对历史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的传承和最好的纪念。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郭璇



目
录

平武报恩寺历史考	1	壁画	221
平武报恩寺建筑	7	石雕	227
总体布局	9	碑文	239
经幢和石狮	18	地震后的报恩寺	249
山门	21	地震灾害对报恩寺的影响与灾后修复简述	250
金水桥	35	地震后照片	252
钟楼	38	附录	262
天王殿	52	报恩寺彩画复原图	262
大雄宝殿	78	报恩寺建筑斗拱形式、等级一览表	264
大悲殿	112	报恩寺大事记	265
华严藏	138	后记	266
万佛阁	157	参考文献	268
御碑亭	190		
附属文物	207		
彩塑	208		

平武报恩寺历史考



一、王府还是寺庙？¹

1. 问题的提出

究竟是原本有计划建筑的寺庙，还是由僭越等级建造的王府改成的寺庙？这一直是围绕报恩寺的一大“公案”，两种说法并存，至今没有定论。

一说报恩寺是明正统五年（1440年）龙州土官金事王玺奏修的报答皇恩的寺庙²。寺内碑文是此说的据证。寺内碑亭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由王玺所立“九重天命碑”《敕修大报恩寺碑铭》是寺内最主要的碑记。碑文说明王玺修寺的原因及寺之规模形制并以溢美之词颂赞王公德行。碑载：“龙阳旧治青川，洪武中徙今乐平（即今平武县城龙安镇）。古有观音院，在今寺之南，规制湫隘，无以容众。土官金事王玺恩无补报，欲大创寺宇，保障遐方。乃于土僧正知叶同开山遂请于朝，皇上允之。纶音既下，卜其美地，水环以流，山拱而秀，掄材鸠工，伐石陶甃。经始于正统庚申（1440年）。龙人之趋势赴功者罔敢或后。越七禩而告成。殿宇深峻，阶墀轩敞。殿之前则有天王殿、三桥、山门、二狮、二幢、钟楼而极其华美，殿之后则有七佛楼、二亭、戒台、龙神祖师之堂而极其壮丽，殿之东西峙以大悲殿、轮藏殿而翼以廊庑，楼之后则环以方丈僧寮、斋厨房舍悉完整清洁。其妆塑点染，雕琢藻绘，黝垺丹漆，金碧琉璃，争光照耀……”从碑文看，建筑的是“报恩寺”，而且经皇上允准，因而为“敕修”。碑中记述建筑配置，主体形制与今留存报恩寺相合。

“王府改寺说”认为报恩寺原是龙州土官王玺僭越等级制度建造的王府。建府之事被察觉后，王玺惶奏建报皇恩大寺。明代对私建寺庙，按例应予惩处。皇上念其土官守边拓疆有功而不为例准之。王玺将王府改成寺庙，即今报恩寺。传说认为报恩寺是北京来的直隶工匠仿北京故宫建造的。传说认为建筑始建于正统五年，完成于正统十一年。对于由府改寺的时间不清晰，且故事带有很多民间故事的成分。传说依据之一为寺内“九重天命碑”圣旨“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以及其他关于王玺及修建过程的传闻轶事。然而传说生命力很强，流传很广。

龙州距京城万里之遥。在今天看来，报恩寺之修建亦不是简单的事件，更不消说五百多年前的明代。两种说法并存，说明这期间定有文章。事实上，人们很难轻易地把规模宏大的报恩寺建筑群与官位

仅在六品的龙州土官王玺联系起来。因此弄清建寺之缘由，就成了研究报恩寺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2. 龙州及王玺

古龙州，即今平武县。位于川西北，四川盆地边缘，是盆地与高原相通的过渡带。宋诗云：“峭壁阴森古木稠，万山深处指龙州，猿啼鸦噪溪云暮，不是愁人亦是愁。”即使现在，现代交通相对发达，由成都到平武也还要几小时，古代平武与外界之联系可想而知。《平安府志》载：“龙城距京师万里之遥”。古龙州似乎是远离尘嚣的静谷。

然而，龙州地处汉夷交错杂处的最前沿。自蜀汉以来，一直是战略要地（蜀汉江油关即在平武县，邓艾经阴平道攻下江油关，蜀汉失西川）。虽弹丸之地却关系着国家的命脉。《龙安府志》载：“……惟我龙州僻处边陲，介在羌氏，松峰积雪，六月如银；柳留凄凉，三春迟暮……舟车不到，作客罕闻……然数西蜀则金川之史册无光；微龙州则西蜀之藩篱莫固。”因其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龙州地区自蜀汉起即有土官政权雏形，直到北宋末年正式设土司政权（一直延续到1956年才彻底取消）。所谓“土”即指边防要塞少数民族自治政权，或是由汉官充任的统治少数民族的政权。“土”政权由土司集团组成。土司政权受控于中央政权，其官制服色品位与汉同级官制相同，只是它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是统治少数民族，“关辖边寨及藩民种类，户口，业产，服色，嫁娶，死丧风俗”“兴学化夷”的机构；另一方面是镇压少数民族，保卫边陲安全的机构。因而，土司政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历代镇守中原的汉族统治者或蒙、满统治者，均把安氏定边的伟命全权交给镇夷土官，特别是明朝。

龙州土司自北宋一直是薛、王、李三姓控制，土司政权世袭。三姓控制平武一带藩民，各拥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藩寨，颇有些藩国余韵。“分封茅土经千载，带砺江山历数朝”是为土司写照。王玺，是明宣德三年（1428年）袭文职的仕郎判官。明初，朱元璋伐蜀。龙州土官三姓争相投靠，镇边有功。宣德八年（1433年）升龙州为宣抚司。王玺任土官金事，相当于六品武职。品位虽不高，但是军事要镇的军权掌握者；虽是小官，王玺有自己的藩民边寨，自己的领地，在自己领地一方，做着事实上的“皇帝”。

因此，王玺有僭越等级的基础。

1. 本章节选自：邵俊仪教授指导、李志荣撰写的《平武报恩寺研究》，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

2. 正统四年（1439年），王玺奏请建寺事宜获允。故也有部分学者将平武报恩寺的始建年代定为1439年。

3. 王玺建造王府的可行性

龙州盛产楠木，为王玺准备了优越的建材条件。正统五年北京大修故宫，平武出贡木。因而为王玺伐材量木提供了方便。传说，王玺逼民交大木，不交便杀头。有材之家多掘坑埋木而逃脱。这说明当时有采木一事。可以说是为皇府，也可以为自己准备。

王玺家资富足，龙州又出产麸金，为其修建营造准备了财力条件；明朝工匠的轮班匠制，为社会上提供了大批可以独立于田地的自由工匠，这就使营建的工匠来源有了保证。

材、财、匠有了保障，营造的工作就有了充分条件。有了心理上的基础，加上物质条件，王府之修建有了可能性。

4. “报恩寺”之说值得怀疑

事实上存在的是报恩寺而不是王府。寺内碑文极力说明是报恩寺，然而，关于报恩寺建造历史的资料，只有寺内所立的“九重天命碑”和“万乘皇恩碑”提供的碑文。碑立于正统十一年，立碑者王玺。前者正面镌刻圣旨：“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背面即敕修报恩寺碑铭。后者碑文为修大报恩寺记，同样记述了报恩寺修建前因后果。总的看来，二碑似乎都在为王玺努力正名。“九重天命碑”铭中说“开基创寺，坐西面东，伊谁檀越，金事王公，奏于帝廷，帝曰准从”，其中可见僭越的存在。而且寺建在前而帝准在后，不若其碑文前讲“纶音既下……掄材鳩工”。这二者是显见的矛盾。而“万乘皇恩碑”开头即说：“建寺奉佛，人心之至善也，然事有可为而不可为，理不可为而为之，均之不得忠君爱国。”而王公因享有世袭爵禄而恩无补报，遂以为建寺为允当“请之于朝。圣天子念其土官特允请而不为例……”可见这碑文其内在微妙的逻辑，王玺是做了“理不可为而为之”的事，碑显然是在为其辩护开脱。

唐代以后，封建统治者对佛教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不准随意私建寺院；不准私下剃度僧尼；实行度牒考试制度；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等。建造寺院要经国家批准，严禁民间建寺。明代洪武年间沿宋代制度加强了对佛教的严格管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命令各州县府只许保留大寺院一所及僧众聚住（注：见《世界七大宗教》陈麟书、朱森溥著），但明代却有许多“报恩寺”及敕修的寺院。特别是英宗正统年间，王振摄政，作为宦官内臣与寺院本有不可分之联系。王振自己就耗巨资在京城建了智化寺；法海寺等其他寺庙都是

宦官修建。王振仅正统五年就度僧道22 300余人。僧道事业在明朝是有些畸形发展的。而王玺为皇帝修建一座寺庙何会引出如此不恭的言辞“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可以推断，王玺违例实质不在于建寺。再说其报恩亦含糊其辞，似是搪塞之词。

更可疑之点是王土司家族修建如此一座报答皇恩的寺庙，应该算是一件大功德。可王氏族谱及《龙安府志》对此绝口不提，这说明建寺并非光耀门户。

然两碑的确是明正统十一年所立，也确是王玺所立。寺也确是正统建筑，但建筑建造动土在先，而奏修寺庙在后。是否原本建寺，值得怀疑。

我们推论王玺原本建造的不是寺庙，而是王府，被察觉才改奏建寺，以报答皇恩为由寻求解脱。从寺内碑文的撰稿人都是朝廷要员这点看来，王玺家族与京城朝廷有某种联系。皇上“不为例而准他这遭”也许是钻了明朝关于建筑寺庙制度的空子，大肆立碑正在于遮掩事实。

二、再论王府还是寺庙？

以上我们脱开建筑，从历史原因上说明王玺修王府之可能性。寺由府改有一定道理，原建即寺值得怀疑。事实上，目前存在的报恩寺就是正统年间建的引起公案的建筑群。因而，我们回到建筑，来说明以上判断推论的真确性。

1. “报恩寺”选址

龙州城地势西高东低，呈三阶梯状，涪江从西环城向东流，北山为城依靠向东延伸，形成三面环水一面依山的形势。

报恩寺位于龙城东城墙脚下一开阔地带。前有涪江水萦绕，左右南北二山遥呼拱托。报恩寺所处环境“水环以流，山拱而秀”。从风水角度讲，是一处理想的建筑场所。寺即坐西面东，顺地势，以东城墙为照壁展开布局。

据《龙安府志》和寺内碑文以及实地考察知，报恩寺址处在王氏园地之内，而且是王氏家族历代认定的风水宝地，并与王氏衙署府邸在同一轴线上。

把一座寺庙，而且是一座大型佛寺，安排到家园中，并占领轴线及风水优势，压倒邸府，这在我国建筑史中是不多见的，也不合情理。

因此，我们认为“报恩寺”址原是为建王府而选定的，并非原即建寺。

2. 从总体布局看

报恩寺主体三进院落，以东西轴线组织。

山门、天王殿、钟楼、大雄宝殿、转轮藏、大悲殿、万佛阁、碑亭与廊庑组成院落，成寺之主体。山门前置广场，辅助用房有斋厨、方丈室、僧房等，现已不存。

主体依地势，层次分明，主次井然。应用建筑的“等级”去谐调强化地势，在强化地势中突出中心重点。建筑等级表现在台基高低、屋顶形式、建筑高度等方面。

辅助用房荫蔽在绿树间，体量卑小。

从整体布局看来，报恩寺主体的完整严谨与辅助用房的草率形成强烈对比。佛寺一方面是神的宫殿，信徒朝拜的场所；一方面是僧的住所，香客的旅舍。中国佛寺吸收宫殿住宅布局的特点，结合其特定要求，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形制，如钟鼓楼设置，主体伽蓝七堂之制等；对于大型寺庙，僧侣用房设置需齐备。今拿报恩寺建筑群与北京智化寺相比可见。智化寺是严谨的禅宗寺院，其方丈、法堂、斋堂设置严谨齐备且安排位置恰当，是寺院布局特点。在报恩寺建筑群中，三进的寺院主体建筑规模相当可观。配套用房并不处于轴线，配置没有一定规则，建筑风格与主体建筑风格不同，前者是官式建筑，后者是民居¹；显然，这是两个时期的建筑，为两种匠师所为，而且显然这些都不在原计划之中。计划建造的是轴线一路，有钟楼而没有鼓楼。钟楼建筑外观、结构与主体建筑轴线一路风格亦完全不同。显见亦是在寺主体建筑计划外添加的建筑。

从布局也可看出，报恩寺并非原本计划的寺庙。其设置安排伊始，没有考虑寺之要求。

报恩寺山门前广场，面积13 560平方米。广场上相对耸立二经幢，二狻猊（即石狮），山门前广场不是寺院建筑所要求的，因为寺庙没有大规模礼仪之要求，从广场看来，与王府联系就很容易解释：王玺是龙州武官，建造王府，应有校兵阅兵设置。事实上，寺山门前广场一直是龙州古校场。至于经幢设置、狻猊设置，则应是改寺后的安排。

山门与天王殿间夹以金水桥，这不是寺庙布置的典型形制。

报恩寺第二进院落即主庭院采用“斜廊式”布局，这是报恩寺建筑群的一大特点。主体建筑两旁采用斜廊的庭院在唐宋时期曾普遍应

用于寺庙、宫殿。明代，南京、北京故宫都沿用古制而用斜廊，而在明代的寺庙中却很少见²。明正统间或前后的典型寺庙如北京智化寺、护国寺等都不用此形制，川西的寺庙亦不见。斜廊院布局到明清已是不很普遍等级较高的一种布局，仅用于宫殿及仿故宫修建的亲王府中。从这点看来，报恩寺采用这种已经很少用的布局，说明其确有仿故宫的可能。

3. 由府改寺的时间

把报恩寺建筑群与智化寺相对照可见，二者在伽蓝名称的配置上有极大相似性。在《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刘敦桢认为智化寺配置是明中叶流行的寺庙制度，证之以北京护国寺残迹、法海寺，特别是佛殿的凸形平面形式，是明中叶寺庙最常用的平面形式。

报恩寺大雄宝殿，亦采用凸形平面，后部有抱厦。然而大殿合基平面是口形，殿身后部凸出部分与合基关系很紧张，与智化寺智化殿、护国寺延寿殿的抱厦平面台基相比，可见报恩寺大雄宝殿抱厦为后加，而不是预先设计。从其抱厦建筑风格，彩画风格与大殿整体风格统一看，抱厦所加时间应当在建筑最后完成之前，即正统十一年前。

因此，我们推论，报恩寺由府改寺的时间是在正统五年至十一年之间，大雄宝殿完成之前。这种由府改寺是有一定参照蓝本的，或许就是北京智化寺。智化寺完成于正统九年（1444年），或者是一种当时流行的庙制。

4. 寺之完成

正统十一年，作为改成寺的报恩寺建筑已经齐备，但是寺并没有完成。

天顺年间，王玺之子接着完成了彩画、佛塑等全部任务，加点了匾额，还为其父塑像于大殿万佛阁，并立碑铭志，最后完成了报恩寺。后经明清无所添建，亦未修葺，直至今日。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报恩寺确是由建府而改成的寺庙。建府过程中，有仿故宫布局的痕迹，改寺则又依据明典型庙制。改寺时间当在明正统五年至十一年之间。因为报恩寺建寺历史的特殊性，使得其建筑群呈现融多种艺术风格于一身的特点，不论从建筑艺术还是从与建筑配合的其他艺术形式（如佛塑、雕刻、壁画等）来看，都反映了这一特点。

1. 僧房部分的建筑已经于近年拆除。
2. 另一例有斜廊的明代庙宇是青海的瞿坛寺。



四川省平武县区位图



平武县卫星图



平武报恩寺卫星图

